

构建三方协同机制 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 秦嗣权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重大关口,这一时期,传统产业升级面临的结构性阵痛与新兴产业培育所需的周期性投入形成叠加效应,使得就业市场呈现出总量压力与结构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已连续4年突破千万人,并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结构调整与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双重压力,给大学生就业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若要破解当前的就业困局,实现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的动态平衡,需要政府、高校与大学生三个主体构建协同发力的有效机制。

构建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生态

扩大岗位供给规模是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基础性举措,需依托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协同发力。政府应充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通过制定并实施一揽子扶持政策,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新兴企业扩大招聘规模,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2025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相关文件,明确对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社会组织给予一次性扩岗补贴,并对国有企业提出保持招聘规模稳定的要求,以此为企业吸纳毕业生提供直接激励与刚

性约束,保障就业岗位供给的稳定性。在拓展基层就业渠道方面,政府需持续推进基层服务项目扩容,2025 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人数已达 3.4 万人,且为保障服务期满人员的职业发展,相关政策明确其可享受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优惠待遇,进一步提升基层岗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引导更多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

同时,各地人才市场应聚焦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通过搭建统一的就业信息共享平台,及时、精准地发布岗位需求与招聘信息,以有效缓解就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毕业生求职效率。

构筑适应产业升级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需加快接轨产业升级步伐以及对接就业市场新需求。首先,高校需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定期定向市场调研机制,了解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的人才需求状况,及时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专业,优化专业结构。同时,对与产业需求脱节、就业率低的专业进行调整或停招,使专业设置更加精准地匹配市场需求,以培养出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可与行业领军企业、新兴领域标杆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将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前沿技术融入课程体系。在合作过程中,应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系统性设计,共同开发实践课程模块,围绕产品研发、市场运营等核心业务流程设置实训项目,让学生在模拟或真实的商业场景中锻炼团队协作、跨部门沟通和问题解决能力。

此外,高校应着力构建贯穿大学教育全周期的就业教育体系。在新生教育阶段,通过设置系统性的职业规划教育课程,引导大学生在专业认知与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树立与个人特质及社会需求相契合的理性就业观念。临近毕业阶段,高校需搭建多层次的校企对接平台,组织大型招聘会、企业定制化宣讲会等系列活动,促进大学生与用人单位深度互动,使其在了解市场人才需求结构与行业发展趋势的过程中,针对性地完善职业准备,实现从校园到职场平稳过渡。

全面强化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

政策环境是学校支持作为外部赋能要素,虽对就业格局优化具有辅助推动作用,但实现就业竞争力突破的核心内驱力仍源于个体能力结构的系统性升级。大学生在职业能力构建过程中,需重点关注可迁移技能体系的培养,这类能力要素涵盖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创新思维能力等,其显著特征是能够跨越具体职业领域与岗位边界,形成适应性广泛的能力迁移机制。

大学生可通过深度融入社团活动、学术竞赛等立体化实践场景,在解决真实问题过程中实现知识转化与能力迭代,进而完成综合素养的渐进式积累。在毕业求职环节,大学生需突破传统信息获取方式的局限,构建多元化求职渠道。除依托校园招聘、人才市场等传统平台外,还应充分整合新兴网络技术资源,实时追踪行业发展动态与就业形式变革。以数字化渠道为例,专业招聘网站、企业官方平台能够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而线上招聘会、远程面试等新型交互方式则拓展了跨地域的职业选择空间。

面对就业压力和竞争,大学生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高校应为毕业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开设定制化的就业心理课程,系统讲解压力管理、职业决策归因等内容,帮助毕业生识别焦虑、迷茫等情绪的根源,并掌握认知行为调节技巧。就业指导机构也可将心理调控能力培养纳入服务体系,在提升毕业生求职技能的同时,通过专项指导增强其心理韧性。

在经济增速放缓与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下,破解大学生就业困局,需构建政策引导、教育改革和个体突围的协同机制,形成环环相扣、互为支撑的动态生态,从而回应经济转型期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契合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源的深层需求,最终实现人才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包头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副教授)

数字技术驱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创新发展

□ 李 磊

随着数字经济与智慧社会加速演进,公共管理领域正经历从“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的深刻变革。公共管理类课程作为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课程,其教学模式与内容创新亟需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使抽象的公共管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的数字化实践,为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人才提供助力。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许多高校已构建在线教学平台体系,“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数字化载体的应用,使课程资源得以在云端实现跨时空共享。部分院校针对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性强、需与现实治理场景对接的特点,专门创设了“政策模拟实验室”与“公共服务虚拟仿真平台”。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将实时社会治理数据融入案例教学,增强了教学内容的时效性。

不可否认的是,部分院校对信息化技术与公共管理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仍存在不足之处。部分课程将信息化技术窄化为传统教学流程的“数字翻版”,例如,仅通过在线平台上传课件、发布作业,或利用直播工具进行单向知识传输,而未将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嵌入公共管理核心理论的阐释体系。而且,虚拟仿真教学在现实治理场景适配方面显著滞后。当前,部分院校构建的政策模拟实验室等虚拟实践平台的仿

真模型设计仍主要基于传统治理框架,明显滞后于前沿实践。这种教学内容与现实应用的脱节,反映了技术赋能教学尚未形成系统性思维的现状。要突破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浅度应用的局限,需从课程体系整体设计与资源建设长效机制等层面进行根本性重构。

教学内容创新,构建数字治理导向的知识体系。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范式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传统科层制架构下的经验决策模式逐渐让位于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平台化协同治理机制也在重塑着公共事务的处理逻辑。这种变革要求公共管理类课程突破传统理论框架的限制,将教学内容与数字治理实践深度耦合,构建具有时代适应性的知识体系。在课程体系设计中,应注重融入数字治理的核心要素,将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治理议题转化为可教学的知识模块。例如,在政策制定环节的教学中,可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在政策预测、效果评估中的实际应用场景,通过具体案例解析数据挖掘是如何帮助识别社会问题的本质、优化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而提升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教学,可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践案例,系统分析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是如何重构服务流程的,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最终达成服务效率提升与用户体验优化的治理目标。这些内容的融入不仅能使学生理解技术赋能治理的内在逻辑,更能培养其在数字化情境中分析

问题的思维方式。

教学资源创新,构建持续学习的数字生态。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教育资源的时空限制,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正从“孤岛开发”转向“生态整合”。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可以建设课程元宇宙资源库,将教材内容转化为富媒体形态。例如,开发“公共管理数字教程”,每章配套 3D 政策模型、专家微课以及互动习题,学生可通过手机端、VR 设备等多种终端访问。在拓展资源建设方面,可以整合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如国家政务数据平台、各省市数据开放门户)、国际组织数据库(如世界银行开放数据、OECD 公共治理数据库),建立“治理数据超市”,让学生可根据课程作业需求自主获取教育公平、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原始数据集,开展实证分析。在教育资源供给方面,可利用 AI 分析工具建立个性化资源推荐系统。例如,系统发现学生在“政策量化评估”模块得分较低时,自动推送政策评估教程、相关领域实证研究论文以及经典评估案例解析视频,通过数据驱动的资源精准匹配实现闭环式学习支持。

教学方法创新,打造虚实结合的教学场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可使公共管理教学打破“教室+教材”的物理限制,构建虚拟仿真的立体化教学场景,实现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建构的质变。院校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政策实验室,学生可在系统中扮演决策者、利益相关者等多重角色,体验公共

管理政策从问题界定、方案设计到执行评估的完整周期,配套实验系统根据输入的政策条款,自动生成经济影响评估报告、社会舆情反馈模拟图,学生需根据反馈不断调整政策方案,直至达到帕累托最优。学校还可在实验室应用 VR 技术构建如城市暴雨内涝应急处置、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管控等高度拟真的危机场景,学生佩戴设备进入虚拟城市,面对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需快速完成医疗资源调度、社区封控决策、信息发布策略制定等任务,系统通过生理传感器评估学生的压力应对能力,事后生成包含决策亮点与漏洞的多维分析报告。另外,还可借助信息技术重塑课堂内外关系。例如,依托线上共享平台及虚拟教研室等载体开展跨地域云端协作教学,让两校师生通过云端协作平台共同分析公共管理案例,共同完成对比研究报告,有效拓展学生在多元治理情境下的认知视野。

信息技术赋能在化解传统教学实践困境的同时,更推动着公共管理教育从知识传授模式转向数字化能力培养范式。未来,需要持续推进信息技术与公共管理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着力培育兼具数字素养、数据思维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系统性的智力动能。

(作者系乐山师范学院教授;本文系乐山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视角下社会工作专业政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SC202413130)成果)

创新党校教学模式 提升干部发展潜能

□ 张剑雄 沈 燕

新时代对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干部培养工作正从注重知识储备与技能训练,向深层次激发个体发展潜能的方向深刻转型。发展潜能是干部面向未来、应对复杂局面、实现持续成长的内在驱动力。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其教学模式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直接决定了其在发掘与提升干部发展潜能方面的成效。因此,推动党校教学模式的守正创新,构建一套以潜能开发为核心导向的培养体系,是当前干部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激发干部发展潜能是新时代党校教学改革的核心目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对干部综合能力与发展潜能提出更高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这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具备

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业务能力,更需拥有强大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以及驾驭风险挑战的能力。这些面向未来的高阶能力,其根基正是干部自身的发展潜能。潜能强的干部,适应性更强,成长速度更快,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持续学习、主动求变、开创新局。因此,干部教育的目标必须超越知识的灌输,转向对潜能的深度开发。

党校的根本职能在于通过系统性培养锤炼干部队伍。党校肩负着为党培养执政骨干的根本使命,其核心职能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在于通过系统性的理论武装、党性锻炼和能力培训,全面提升干部的综合素养。新时代背景下,党校的这一根本职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要成为干部发展潜能的激发器与孵化器。这意味着党校的培养工作必须更具前瞻性,着眼于干部的长远发展,通过科学的教育引导,帮助干部突破思维定势与能力瓶颈,为其职业生涯的持续进步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为党的事业发展储备充足的后备力量。

以潜能开发为导向的党校教学模式创新实践路径

构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导向型模块化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教学内容的基础载体,其设计必须服务于潜能开发的目标。应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围绕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构建模块化的课程体系。每个模块都以一个核心问题或一项复杂任务为牵引,有机整合相关理论知识、政策法规与实践案例。这种问题导向型的设计,能有效激发学员的求知欲与探究欲,引导其将所学理论迅速应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模块化的结构则保证了课程的灵活性与时代性,能够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和学员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快速迭代与动态组合,使课程内容始终保持新鲜与高效。

推广案例式、研讨式、模拟式等多元化互动教学方法矩阵。单一的教学方法难以适应潜能开发的多维需求,必须构建多元互补的互动教学方法矩阵。案例式教学通过对真实情境的深度剖析,培养干部的分析判断与决

策能力;研讨式教学通过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提升干部的辩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模拟式教学(如情景模拟、沙盘推演)则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锤炼干部的应急处突与协同作战能力。将这些方法有机结合,形成一套组合拳,能够将学员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能力建构者,在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中,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团队协作等关键潜能将得到有效激活与强化。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校的教育事业正面临着深刻的时代转型。将教学目标从传统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升级为对于干部发展潜能的全面激发,是这一转型的核心所在。这要求党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创新。通过构建问题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推广多元互动的教学方法矩阵,二者协同推进,党校将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干部突破自我局限,释放内在在潜能。这不仅提升了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必由之路,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锻造一支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战略举措。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 陈烨伟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下,“政策沟通”与“设施联通”已取得显著成果,而“民心相通”作为更深层次、更具挑战性的目标,难以仅靠单向宣传实现,需要依托双向互动、共情与理解。

在全球媒介格局加速演变中,短视频以即时、直观与沉浸特性,正重塑跨文化交流逻辑,使国家战略在日常叙事中获得鲜活表达。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成为独特的叙事主体,凭借双重文化身份与真实生活体验,主动运用短视频展开个人化、民间化叙事,记录鲜活的中国日常,呈现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多重视角。其影像叙事超越语言与地域边界,以个体经验构筑情感共鸣,推动“民心相通”在微观层面的落地。短视频不仅是技术媒介,更是文化实践与民间表达的重要载体。

跨文化叙事者的身份建构与传播优势

来华留学生实现从“知识学习者”到“跨文化叙事者”的身份转化。其既是文化的亲历者,又是转译者 and 阐释者,具备讲述中国故事的天然优势与叙事力量。

留学生的叙事权威体现在“内部体验者”与“外部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内部体验者”,深入中国日常生活与社会肌理,使影像叙事超越猎奇趣味,呈现真实可感的生活场景;作为“外部观察者”,往往带有自身母国的文化背景与参照维度,能以比较、反思乃至审慎审视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单一内部视角可能存在的局限与认知盲区。

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与媒介特性在创作中的交融,构成其叙事的独特魅力。两种文化在创作中交汇、对话与共生,实现了哲学家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视域融合”:既融入真切的个体经验,又蕴含跨文化的反思,最终让叙事更贴近真实、更富复杂性,也更具共情力。由此生成的并非是外部符号化的“想象中国”,而是在交融、比较与认同中构筑的“真实中国”。

短视频的具身传播与情感共同体建构

短视频的独特媒介特性,使其不仅是信息载体,更成为跨文化体验与情感联结的具身平台。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现场声音、即时互动与动作捕捉,观众能“跟随”留学生,在场景观看、聆听、感受其生活与文化体验,实现跨文化感知共振。

媒介实践有助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间建构“共同体想象”。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想象,而数字时代的共同体愈发依赖共享的情感体验。来华留学生的短视频作品,通过呈现好奇、惊叹、尊重与热爱等人类共通情感,形成跨越地域与文化界限的情感纽带。观众可将个体体验升华为对他者生活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生成临时却真实的跨文化情感圈。

在叙事策略上,来华留学生的短视频创作呈现从文化震惊到情感认同、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对话的递进逻辑。例如,在笔者作品《花木兰与傣医药的奇妙之旅》中,留学生花木兰以第一人称视角参与傣医药体验,在知识与文化理解上形成共享的情感体验。再者,通过文化比较与理性反思的叙事策略,留学生在短视频中引导观众从其共情走向理解。例如,笔者作品《我在中国遇见彝绣》中,老挝留学生茉莉和米达娜对彝绣的叙事从开始了解彝绣之美“是什么”,到主动理解彝绣的“为何之美”,再到探索“如何之美”,为观众提供跨文化对话空间,促使感性认同上升为理性理解,构建尊重与认同的跨文化共同体想象。

多元传播与共同体想象的实现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短视频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内容本身,更在于多渠道的传播。作品通过官方平台、区域性媒体及新媒体渠道实现精准触达,形成复合式传播效应。留学生既是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又是跨文化传播节点,使个体叙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放大。

对于沿线国家受众,来华留学生“自己人”身份提供了可信、亲切的文化视角,激发了其对中国的兴趣、好奇与向往;对于中国受众,则因看到自身文化被外来者珍视和理解而产生文化自豪感与情感共鸣。这种双向互动不仅增强了跨文化认同,也在心理层面夯实了民间友谊基础。通过社交媒体的分享与算法推荐,个体化的情感体验逐渐汇聚成数字化的情感共同体,实现跨地域、跨文化的“共同体想象”,完成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具体落实。

内容的多元化、传播的即时性及情感的共享性,使短视频成为跨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载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理解与认同提供了生动、可操作的路径。

来华留学生的短视频实践,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宏大叙事转化为多元民间表达,为政策理念注入生活化、情感化的传播能量。这一实践表明,短视频不仅是信息工具,更是跨文化交流的平台——个体体验被感知、共享、想象,形成社会心理层面的共同体认同。展望未来,随着短视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Z 世代”留学生的持续参与,民间叙事与跨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将愈发丰富与深入。个体的故事能激发全球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为全球文化交流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动而有力的支撑。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本文系昆明理工大学 2023 年度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与精品培育项目“向世界讲述中国——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系列短视频创作与传播”研究成果)

微叙事联结大战略：留学生短视频的跨文化传播价值